

蔡元培

马相伯

鲁迅

张伯苓

王国维

晏阳初

罗家伦



乱世犹闻

读书声

（ 中国教育 1912 — 1937 ）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乱世犹闻
读书声

中国教育
1912—1937

张兴龙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犹闻读书声：中国教育1912~1937 / 张兴龙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7-308-12174-3

I. ①乱… II. ①张… III. ①教育史—中国—1912~
1937 IV. ①G5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0746号

乱世犹闻读书声：中国教育1912—1937

张兴龙 著

责任编辑 杨利军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14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174-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第 1912—1919

一

部 枪炮喧嚣后 整饬教育待从头

「一」 1912 年：“壬子癸丑学制”的前前后后	3
民国教育人物 蔡元培：翰林前传	23
「二」 1915 年：逆流与乱象	33
「三」 1917 年：风流云散的北大	53
民国教育人物 马相伯：国之大老	70
「四」 1919 年：新文化运动与教育改革	79
民国教育人物 鲁迅：民族魂魄归何处	94

第
二
部

1920—1927

西学东渐 新教育运动的本土化

「一」 1922 年：青山遮不住的新学制	103
民国教育人物 张伯苓：永远的南开校长	122
「二」 1925 年：职业教育的洪流	133
民国教育人物 王国维：超越滚滚红尘的诗意	147
「三」 1926 年：定县实验	156
民国教育人物 晏阳初：平民教育之父	172

第
三
部

1928—1937

二水分流 党化教育下的两张面孔

「一」 1928 年：女子高等教育“双城记”	181
「二」 1929 年：三民主义教育狂潮	197
民国教育人物 罗家伦：徘徊在学术独立与政治涉入之间	211
「三」 1936 年：生活教育	219
民国教育人物 陶行知：两千年后的孔子	233
后 记	239

第 1912—1919

部 枪炮喧嚣后 整饬教育待从头

推翻封建帝制后的中国所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是民国政府构建西式国民教育大厦的基础。正是以此为起点，才有了后来神话传奇般的民国教育大师风范。虽然期间不乏教育逆流与乱象，但是，北大的教育思想与新文化运动撕开的教育改革，仍然成为这一历史板块中最经典的记忆。

民国的历史太短，短到如同漫长历史板块之间的一条夹缝；民国的治乱太频，乱到人类所有的灾难几乎全部降临；民国的英雄太多，多到“大师”云集无法用数字计算；民国的话题太沉重，重到今天忆起仍然无法释然。

仓皇乱世，究竟应该从何说起？

百年已过，我们的教育陶醉于数字上的不断刷新，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国际纪录”、“世界之最”，应试教育的枷锁仍然未能解除，素质教育的目标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凭借他们富有的资产，让子女漂洋过海，去享受西方“美式教育”、“英式教育”的快乐，逃避已被妖魔化的应试教育。西方的教育似乎成了黄皮肤、黑眼睛的孩子们天真个性的庇护所，扮演着“救世主”的形象。这时，我们耳边“救救孩子”的呼声显得如此悲壮。

我们的目光重新触及那个短如夹缝的民国历史区间，同样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教育舞台的大幕徐徐拉开，耀眼的聚光灯下，舞台的中央是鲜活的各色面孔，这里弥散着各异的声音：“迂腐顽固”的清朝遗老，带着学生尊孔读经；“投机的政客”，口若悬河地宣扬政治教育；学贯中西的留洋博士，高蹈民主思想启蒙；激进的革命斗士，狂飙突进教育革命……众声喧哗，百家争鸣，共同奏响民国教育历史的曲音。之所以再次把目光聚焦于他们身上，源于他们学贯中西的大师风范，源于他们桀骜不驯的张扬个性，源于他们教育理想的自由赤诚。在当下，回眸民国教育历史中的点点滴滴，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的启示和警醒意义。

〔一〕

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的前前后后

1912年1月1日，辛亥革命的枪炮声稍有平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月3日，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9日，在南京碑亭巷内务司楼上三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郑重宣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

就这样，身为堂堂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学贯中西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乘两轮的人力车，在人力车夫的一路奔跑摇铃声中，穿越南京拥挤的街道，亲自去大总统孙中山的办公处领取官印。虽然这次上任不过经历短短数月——因为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蔡元培在同年7月愤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然后偕同家人奔赴德国留学考察——但是，蔡元培临危受命筹建民国教育部的动人情景，一度被人们列为民国开国史上的趣谈。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他为民国教育演绎了一段经典传奇。

然而，作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摆在这位清末著名翰林面前的困难是空前的。

民国初建，百废待兴。1月3日，蔡元培凭借其在教育界的崇高威望，临危受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职。可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桂冠外表光鲜，内在寒碜。蔡元培受命之际，教育部简直就是一个“草台班子”，甚至没有办公的地方，为此，蔡元培询问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得到“国父”答复：“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言下之意，不要指望国家给你安排了，一切都要自己想办法。此时蔡元培心中滋味莫可名状。

一个月前欧洲游学之时，惊悉国内革命，蔡元培欣喜若狂，乃至夜不能寐。刚刚抵沪之时，也有好友提醒国内教育已经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烂摊子，让他不要接手。深谙国情的蔡元培对于其中困难何曾不知？但是，物质匮乏竟然如此，还是令他措手不及。他无奈地在南京城的旧提学使署、南洋劝业会、狮子桥等处连续数日奔波，寻找办公地点，但未果。一筹莫展之际，他遇见了恩师马相伯。当时，马相伯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他允诺借出内务司办公楼的三个房间，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这才有了“官署”。堂堂民国教育总长，却连寻觅一间办公室都如此窘迫，其将面对的重新整饬全国教育伟业将会遭遇怎样的艰难，由此可想而知。

历史总是不断地创造神奇，民国的历史注定了蔡元培把神奇的故事进行到底。匮乏的人力资源拷问着蔡元培总揽全国教育大局智慧的同时，也成就了他成为这个神奇故事的主角。

教育部创建之初，仅蔡元培、蒋维乔和一名会计，总计三人。蒋维乔，1873年生于江苏武进，自幼饱读诗书，20岁中秀才，曾留学日本，力主“西学”，倡导中小学新式教育，于1902年加入蔡元培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后长期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教科书，并主持商务所办的新式学堂。蔡元培赴南京就职之前，身在上海，他到蒋维乔家中登门拜访，恳切地邀请蒋维乔共赴教育部，助他一臂之力。蔡元培说：“去国多年，于近来国内情形殊多隔膜，望公相助为理，部中一切，事无大小，皆愿为我计划之。”面对如此真挚的恳请，没有人会无动于衷，何况蒋维乔同样心怀国家，又念及与蔡元培的故友之情，于是慨然应允，任教育部参事，负责草拟法令。

为了尽快搭建一个以新式人才为主要成员的教育部，蔡元培致电全国的有识之士，真切地邀请他们为国家教育出智出力。年仅23岁，只是小学毕业的王云五与蔡元培从未谋面，素不相识。当时他被聘任为大总统府秘书，写信给蔡元培阐述自己对教育的一些主张。蔡元培认为他的建议极为中肯，立即回函邀请他来

教育部工作。最终，经过孙中山的同意，王云五上午在总统府办公，下午到教育部做事。

蔡元培选用部员，不论党派，不计年龄，唯才是用。为了尽快招揽到人才，他采用了多种途径：其一是邀请早年曾经一起共事的朋友，如蒋维乔、钟观光、王小徐等；其二是邀请留学德国时的同窗，如俞大纯、钱方度等；其三是邀请对教育学有研究的学者，如鲁迅、许寿裳等。经过紧张而忙碌的招贤纳士工作，蔡元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建了包括誊抄人员在内的 30 余人。



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中坐者）

图为 1921 年 8 月，蔡元培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到檀香山出席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时与代表团成员的合影。

自古文人多相轻。民国本是一个大师云集、硕儒迭出的时代。桀骜不驯、恃才傲物的名流如恒河沙数，他们往往喜欢追慕魏晋风流，采取与世不合作的态度，彰显人格气节。在世俗者看来，能够被教育部征召，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却意味着“被招安”的气节尽失和人格的同流合污。为了维护个人的清誉，更是为了捍卫传统大儒的尊严，教育部急需的许多重要人选，对蔡元培的热情邀请回报以冷漠和不屑。但蔡元培凭借自己的人品、风范和学问，赢得了追慕魏晋风流的名士们的尊重。他的邀请让一道又一道紧闭的大门打开。

我们不妨通过蔡元培致王少泉未见回复函而再次致函的信件，走进这位伟大教育家广阔无边的心灵世界：

少泉先生惠鉴：

两寄函、电，未蒙赐复，引领津桥，曷胜企盼。此间接手伊始，百端待举。对于京师、北洋大学，更须待商执商。即本部专门学务一项，尤盼仁者惠临，主持一切，教育前途之光荣也，岂仅鄙人承教受益已耶。此书达左右后，敬请执事即日命驾莅京，来部赐教，不胜切急企盼之至。^①

①

蔡元培：《函电》，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9—151页。

这是何等广阔的胸怀，又是怎样为国家教育忍辱负重的历史担当？

蔡元培邀请所有人选都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绝不考虑私人恩怨、党派不同、政见分歧。即使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异党分子”，他同样以国家大计为重，诚恳邀请。例如，他再三恳请非国民党籍的范源濂担任教育部次长。这位与蔡先生教育观点上存在分歧的学者后来回忆当初蔡元培的邀请，深为其真诚正直所感动。当时蔡先生两次亲自访问他，并且诚恳地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蔡元培先生再三强调，之所以敢于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范源濂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经过蔡元培几次真诚和热情的劝说，范源濂终于接受了他的任职请求。这个决定曾经使范源濂受到不少更亲近的前辈朋友们的责备误会，可是范源濂并不后悔。在他和蔡元培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有很多讨论，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事情一经决定，立即执行，所以虽然时间很短，办的事却很多。^①

历史赋予了蔡元培满目凋敝、乱象纷扰的教育现状，蔡元培通过一己之力回报历史的则是泽被千秋的教育长城。

面对凋敝和混乱的民初教育现状，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将如何着手工作，开始他不平凡的 1912 年？

被民国枪炮惊醒搅乱的中国教育，在 1912 年已经成了纷乱如麻、惶恐不安的烂摊子。经纬万端，教育整饬首先需要从学制入手，所谓学制，就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规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推行教育的根本纲要。

民国之前的中国教育学制事实上有两个，即晚清政府 1902 年和 1904 年制定的壬寅、癸卯学制，这两个学制虽然是在清王朝统治期间制定，但是，与许多人想象中的清朝学制充满了腐朽死亡气息不同，中国从它们开始已经启动了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历史学界甚至评价，晚清新政中最富积极意义而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当推教育改革。那么，被历史定性为腐朽无能到极点的晚清政府，究竟怎样开始了“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新式教育？这样的学制和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学制改革，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壬寅学制的诞生，源自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清廷犹如黑夜中驶入风高浪急大洋之上的一叶孤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先是 1895 年中日甲午海战以清廷惨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告终，继而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 年又签订《辛丑条约》得以保存国家，面对人人得以欺之、屡战屡败

①

高平书：《蔡元培年谱长编·上》，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12 页。

的现实，以及天文数字的战败赔款，国内民众反抗之声此起彼伏，生存环境之险恶可想而知，这一切都迫使清廷要员们寻找可以躲避被洋人坚船利炮炸得底朝天的厄运之生路。

人类理性思考的一个习惯在于，当被别人欺负的时候，最容易想到欺负你的人为什么如此强大。在黄海海面刚刚被日本人狠狠“教训”一番的晚清政府，最先反思的是日本民族为什么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色，转眼成了侮辱和损害我们的人。他们考察日本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国内教育效法西方大获成功，并且提升了国家实力。日本教育成功之路给晚清王朝吃了一颗定心丸，教育成了当时挽救国家覆亡的最合适的一剂良药。对此，深谙日本社会发展的梁启超曾说：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欲其大成，在变官制。^①

梁启超是整个晚清时期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学者，他都认为教育可以救国，那么，立刻整顿国内教育，实现教育救国当然是顺理成章之事了。1901年，清廷下发了一道黄灿灿的诏书，诏曰：

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外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学堂。^②

1902年1月10日，有“中国大学之父”美誉的张百熙被

①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梁启超著，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②

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一百六十九，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本，第1页。

清政府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王朝学制的工作。同年，8月15日，由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因为这一年是壬寅年，史称该学制为“壬寅学制”。这个学制试图通过效法欧美、日本等列强的教育经验，特别是近邻日本学制的形式，帮助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教育旧制。依照此学制，国内教育分成初等教育（分为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三级，共十年）、中等教育（分为中学堂一级，共四年）、高等教育（分为大学预科、大学堂、大学院三级，共七年）三个阶段。

客观地说，壬寅学制的缔造者张百熙，个人并不主张学生以科举仕途为人生目标，在当时科举制度价值观念占据教育主流形态的情况下，非常难得地强调知识学术价值。1904年，张百熙语重心长地告诫新科进士金梁：“京师乃人才荟萃之所，来者皆志在得官，君当以求学问为先。官岂可求，惟学问必求而始可得尔。”但是，他个人既无力、也不可能阻止科举教育对学生的毒害，因此，这份深深烙下日本教育学制痕迹的国家规划，不可避免地遗留或者干脆说刻意添加了晚清教育的标志性文化元素：忠君爱国的德育思想和等级森严的礼仪。壬寅学制要求学生忠君爱国，尤其是帝王礼仪，更是一个都不能少；每年恭迎奉候皇太后万寿圣节、皇后千秋岁、至圣先师诞日、春秋丁祭日，等等，全部由教习率领学生行跪拜大礼；即使开学、放假日，初一、十五等日，也全部由教习率领学生行跪拜大礼；学生每天早上参见教习，也一律作揖致敬。

壬寅学制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斩断封建教育观念，残留着浓厚的封建忠君教育思想，而这个问题不仅成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学制改革的基本内容，甚至在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成为一种教育的“余毒”，冲击着民国教育，而与之进行的斗争则成为民国前期教育家的一大历史使命。

七年之后，鲁迅任职于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新任校长夏震武就极力奉行壬寅学制的教育模式，要求学校教务长许寿裳陪他“谒圣”，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在孔子像前跪下，并且以封建社会下属拜见上司礼节与他相见。这遭到鲁迅等人的强

烈反对，鲁迅等进步教师愤然辞职。此举在学生中引发巨大反响，进步学生强烈抵制夏震武的教育管理主张。由于夏氏顽固木讷，学校进步师生称其为“夏木瓜”，此次风潮遂被称之为“木瓜之役”。

十年之后，蔡元培先生以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之名建立壬子癸丑学制，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彻底破除了这种封建忠君思想和奴性跪拜礼仪模式。

十五年之后，同样是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教育改革，一个同样重要的成就就是，将学校残存的封建衙门等级秩序和忠君教育流毒清扫了个干净，恢复了大学应有的自由民主精神。

这些留给后人解决的难题，在当时也受到了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力量的冲击。在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张百熙亲手制定的壬寅学制根本无法实行，一年之后，就被新的学制所取代。

1903年，清政府下令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等人共同重新拟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正式登场。1904年是癸卯年，故此次学制史称“癸卯学制”。

较之两年前颁布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延续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七级的壬寅学制内容，但是，每个阶段和级别又增加了诸如培养目标、立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奖励等详细规定，且每个阶段的分级也更加明确合理，最重要的是，这个学制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全国各学堂统一遵守的立学宗旨：

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灌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①

①②

转引自杨文海：《壬戌学制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13页。

这个由张之洞亲自打造的癸卯学制，除了仍然模仿国外教育模式之外，特别强调读经的重要性，明确宣扬从小学到中学，只要能读完四书一部、大经一部、中小经一两部，就能够“义理必已明白”，大有“读经数部，其义自现”的味道。事实上，在具体贯彻这个学制的过程中，国内学堂每周都加大读经课时，全国学校掀起一股读经热潮。此举沦为当时许多外国教员的笑柄，他们讥讽中国正愚蠢地“可藉以经义战胜各国”。有人研究统计，癸卯学制中小学每周读经时数和百分比如下^②：

学堂类别	读经时数	总学时	读经占总时数百分比
初等小学	12	30	40
高等小学	12	36	33.3
中学堂	9	36	25
初级师范	9	36	25
优级师范	5	36	14

在洋务运动中大出风头的张之洞如此迷恋经书，并不全是他个人的封建思想在作祟，而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对经书在中国人精神信仰中作用的误解。事实上，他把中国的经书当作西方的宗教，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经书就是中国之宗教，学校万万不可废除读经传统，中国虽然贫弱而人心尚不至于离散，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人人诵读经书，“纲常名教礼义廉